



文学与人类学

叶舒宪◎著



陕 西 师 范 大 学 出 版 总 社



文学与人类学

叶舒宪◎著

陕 西 师 范 大 学 出 版 总 社

图书代号:SK18N0179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学与人类学 / 叶舒宪著. —西安:陕西师范大学
出版总社有限公司, 2018. 3
(中国文学人类学原创书系)
ISBN 978 - 7 - 5613 - 9837 - 1

I. ①文… II. ①叶… III. ①文学研究—世界
IV. ①I1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35921 号

文学与人类学

WENXUE YU RENLEIXUE

叶舒宪 著

责任编辑 王晓飞 巩亚男

责任校对 王红凯

装帧设计 田东风

出版发行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
(西安市长安南路 199 号 邮编 710062)

网 址 <http://www.snupg.com>

印 刷 西安市建明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20mm×1020mm 1/16

印 张 14.75

插 页 2

字 数 219 千

版 次 2018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613 - 9837 - 1

定 价 68.00 元

读者购书、书店添货或发现印刷装订问题,影响阅读,请与营销部联系、调换。

电话:(029)85307864 85303635 传真:(029)85303879

总序

2018年,正值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纪念之际,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推出“中国文学人类学原创书系”,对改革开放的时代大潮在人文学界催生的这个新兴学科,给出一个较全面的回顾与总结,以便继往开来,积极拓展人文学科的教学与研究新局面,可谓恰逢其时。

50后这代人的青春岁月,激荡在汹涌澎湃的“文革”浪潮之中。“文革”后的改革开放,相当于天赐给这一代知识人第二次青春。1977年恢复高考,我们在1978年春天步入大学校园,那种只争朝夕、如饥似渴的求学景象,至今仍历历在目。改革开放带来“科学的春天”,也第一次带来人文科学方面的世界景观。正如改革的基本方向是向发达国家学习市场经济模式一样,人文学者们也投入全副精力,虚心学习借鉴国际上先进的理论与研究方法。“神话-原型批评”就是当时的新方法论讨论热潮中,最早进入我们视野的一个理论流派。1986年我编成译文集《神话-原型批评》时,先将长序刊发在《陕西师范大学学报》上,文中介绍原型理论的宗师弗莱的观点时讲道:

物理学和天文学形成于文艺复兴时期,化学形成于18世纪,
生物学形成于19世纪,而社会科学则形成于20世纪。系统的文



学批评学知识到了今天才得以发展。……正像自然科学体系的建立有赖于把握自然界本身的规律。一部文学作品,它所体现的规律性因素不是作家个人天才创造发明的,而是在文学的历史发展中,在文化传统中所形成的,这种规律性的因素就是原型。

从文学史的考察中可以看到,文学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植根于原始文化,最初的文学模式必然要追溯到远古的宗教仪式、神话和民间传说中去。“这样说来,探求原型实际上就是一种文学上的人类学”。

II

当时无论如何也不曾想到,这样一段话,居然能够准确地预示这一批学人后来几十年学术探索的方向。“文学人类学”这个名称,也就由此在汉语学术界里发端。10年之后的1996年,在长春召开的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第五届学术年会上,中国文学人类学研究会宣告成立(首任会长为萧兵先生),如今简称“文学人类学研究会”。从研究文学的神话原型,到探索华夏文明的思想、信仰和想象的原型,这一派学者如今正式提出的大小传统理论和文化文本符号编码理论,可以说早已全面超越了当年所借鉴学习的原型批评理论,走出文学本位的限制,走向融通文史哲、宗教、艺术、心理学的广阔领域。

从1986到2018,整整32年过去了,我们也经历了自己人生从而立到花甲的过程。如今我们要解读的是5000多年前的先于华夏文明国家的“文化文本”,阐发的是河南灵宝西坡仰韶文化大墓的神话学内涵。这是当年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是问题意识,先把我们引入文化人类学的宽广领域,再度引入中国考古学的全新知识世界,这样的跨越幅度,的确是当初摸索文学人类学研究范式时所始料未及的。

从原型批评倡导的文学有机整体论,拓展到文化符号的有机整体论、史前与文明贯通的文化文本论,这就是我们努力探索近40年的基本方向。自从西周青铜器上出现“中国”这个词语,至今不过3000年时间。2018年2月4日,我第二次给国家图书馆“文津讲坛”开设讲座,题目是“九千年玉文化传承”。今日的学者能够在9000年延续不断的文化大背景中研究



“中国”和“中国文学”，这就是从先于文字的文化大传统，重新审视文字书写小传统的一套完整思路。相信这样一种前无古人的理论思路和研究范式，是本土学者对西方原型批评方法的全面超越和深化，这将会引向未来知识更新格局。

本丛书要展示这 40 年的探索历程，以萧兵先生为首的一批兴趣广泛的学人是如何一路走来，并逐渐成长壮大的。本丛书将给这个新兴学科留下它及时的也最有说服力的存照。希望后来者能够继往开来，特别注重不断发展和完善中国版的文化理论和文学理论，包括作为文史研究当代新方法论的三重证据法和四重证据法。

是为丛书总序。

III

叶舒宪

2018 年 2 月 7 日于北京太阳宫

引言

文学是“人学”。这是文学家高尔基曾用过的比喻，现已被传为文学界的名言。文学爱好者和文学专业的师生对此都非常熟悉。

还有一门同样以人为对象的学问，文学爱好者不太熟悉，那就是人类学。

“人类学是人的科学”^①。这是著名人类学家克鲁伯(A. L. Kroeber)在他的专业教科书《人类学》第一章第一节写下的第一句话。

人学与人的科学，用字虽有繁简之别，但从常识判断，大致可以看成同义词。将这两个理论命题放在一起，人们自然会产生疑问：文学与人类学这两门人的学问之间，在其对象上有怎样的相关性？在内容范围上有哪些重合点？在视角和方法上又会有怎样的外在与内在联系？二者的联系是如何开始的，又将以何种方式延续下去？

当初，也就是20世纪的初期，高尔基和克鲁伯分别讲出他们的名言时，上述的学科关联性问题还没有明确出现。文学圈子里的人只是在比喻的意义上理解高尔基的“文学人学”说，并且津津乐道。克鲁伯在他的教科书里只注意区别了作为晚生的“人的科学”的人类学与其他研究人的学

^① A. L. Kroeber, *Anthropology*,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Company, 1923, p. 1.

科(如生理学、医学)、其他研究人的作品(works)的学科(如政治史、经济学、文学批评和艺术史)之间的差异,因为他的目的是要说明人类学的特性所在。至于学科关联性,他只是一笔带过:“肯定有确实的和可探究的关联。”仅此而已。当年的人类学尚处在初级阶段,为了争取它在大学课堂上的合法地位,人类学家们所要强调的当然是学科的独立和特殊的一面。

到了20世纪后期,在无情的市场社会和新兴媒体的双重夹击下,作为“人学”的文学逐渐失去了往昔的神圣性和号召力,遇到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甚至出现“文学已死”的呼声。而作为“人的科学”的人类学却在学科危机中杀出一条生路,以其特有的核心范畴“文化”为媒介,给包括文学在内的所有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带来广泛的影响。在这种影响之下,文学与人类学的关联性受到空前的关注,我们不仅很容易看到诸如“文学与人类学”或“人类学与文学”之类的学术研讨会和著作名称^①,而且还名正言顺地出现了“文学人类学”和“人类学诗学”(详见本书第四章)这样的“科际嫁接”或“跨学科转基因杂交”的新名目。此类迹象的日渐增长,似乎清楚地预示着传统的文学创作、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都在面临着一种可能的变化格局。

本书尝试较为系统地梳理文学与人类学这两大学科之间产生的互动、交叉和理论创新的主要线索,描述在这个重叠的边缘地带所滋生的新的理论与视角的变化轨迹,回顾文学人类学研究在过去一个世纪中取得的进展与成绩,展望它在知识全球化时代的科际整合与重构中的发展前景。期望能够对“后文学时代”的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方法提供一些可资借鉴的经验和背景资料,为拓展我们的人文视野和重塑我们的文化与学术身份提供某种参照。

^① P. A. Dennis and W. Aycock ed., *Literature and Anthropology*, Texas Tech University Press, 1989.

目录

第一章 知识全球化与人类学的兴起

一、人类意识的形成与人类学的诞生	001
二、人类学与知识全球化进程	004
三、知识全球化、“跨文化生存”与本土再阐释	007

第二章 人类学与后现代认识论

一、文化趋同时代的求异思维	013
二、新人类与德勒兹的后现代哲学	019
三、他者是一种可能的世界	023
四、地方性知识	024

第三章 20世纪的文学与人类学互动

一、超现实主义与“文化并置”	031
二、发现原始思维与认同原始文化	033
三、反叛现代性与灵魂治疗	042
四、后现代主义的原始向度	046

五、文化他者与“人类学想象”	049
六、从文学到人类学	056
七、从人类学到文学	061

第四章 20世纪的人类学与文学批评互动

一、文学批评家的“文学人类学”	071
二、文化诗学：新历史主义的文化批评	077
三、人类学家的“文学人类学”	079
四、文化主体性与“人类学诗学”	084
五、口传文化与“民族志诗学”	092

第五章 弗莱的文学人类学思想

一、弗莱：从比较文学到文学人类学	099
二、解剖《批评的解剖》：文学总体观	104
三、弗莱的文学总体观与人类学	108
四、弗莱与文化相对主义	115
五、弗莱与新历史主义	118
六、弗莱在文化研究中的位置	122

第六章 后文学时代的文学研究

一、“文化”概念的破学科效应	125
二、“文化”概念的学科整合效应	129
三、从比较文学到比较文化：文学人类学的可能性	138
四、比较文学如何通向文学人类学	140
五、比较作为文化对话的一种形式	143
六、后殖民时代多元对话与人类文学经验的整合	147
七、从本土话语到世界话语	151



第七章 神话学:文学与人类学的交叉点

一、神话与“迷思”	157
二、神话的意蕴:神人关系	161
三、神话学的起源	167
四、现代神话学的解读流派	171

第八章 文学人类学研究在中国

一、神话学的引入与文学观的拓展(上)	181
二、神话学的引入与文学观的拓展(下)	187
三、三重证据:知识全球化时代的文学研究	197
四、当代文学人类学研究的本土实践	207
 主要参考书目	215
 后记	222



第一章 知识全球化与人类学的兴起

001

一、人类意识的形成与人类学的诞生

文化人类学这门学科的产生同知识全球化的进程是息息相关和互为表里的。

没有地理大发现所带来的全球航行和全球贸易,世界一体化的实现就根本不可能。建立在世界一体化基础上的知识更新和观念变革,直接催生了世界文化的整体意识,以及把世界各地的人视为同类的“人类”意识。人类学只有在世界文化的整体意识和人类意识形成之后才得以诞生。“大发现”不仅是地理的大发现,而且也是人类的大发现^①。

这就说明了为什么人类学在整个人类知识发现中显得相当滞后,一直到19世纪后期才姗姗来迟地作为新兴学科加入到晚生的社会科学的门类中来。

按照19世纪大哲学家黑格尔的看法,理性的人区别于动物的本质就

^① 参考 G. Geana. *Discovering the Whole of Humankind*, in *Fieldwork and Footnotes*, ed. by H. F. Vermeulen, Routledge, 1995, pp. 60-62。

在于发展出了“自我意识”。他还认为世界历史发展到古希腊文明时，人类才拥有了真正的自我意识。但是他没有想到的是，人类意识的产生在世界史和思想史上之所以如此滞后，甚至还要大大晚于生物学、植物学和人体解剖学，其根本原因在于人类各个社会集团过去始终无法超越“自我中心”的认识局限，总是习惯于把自己的民族和自己的文化看成是属人的或高等人的，而将一切文化他者视为非人的或低等人的。人类在文化观念上的这种偏见和盲点居然伴随着所谓理性和自我意识延续了两千多年，乃至体现在黑格尔这样近代以来最渊博的知识体系构建者身上。他在《历史哲学》中把他所从属的西方基督教文明描述为人类历史发展的最高代表时，他在贬低东方人不知道自由、不懂得自我意识时，显然仍深陷在传统的种族主义偏见中不能自拔。而以希特勒为代表的德国法西斯在 20 世纪中期仍然坚信日耳曼种族优越论，并以此为理由对他们所认为的低等人类如犹太人等实行灭绝政策，这就充分说明了新建立的“人类”意识还是多么的不普及和多么的脆弱，而传统的党同伐异的种族观念和民族观念又是多么的顽固和难以根除。

人类学者陈其南指出，人类的族群差别虽然有其生物性的基础，例如白种、黄种和黑种等一般性的分法，但是其连续性仍然十分清楚，有些族群实际上不能根据生物特质断然划分。另一方面，我们看到许多最极端的“我群”“他群”之分别，主要是建立在主观的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差异上。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敌对关系，并未发生于生物性的种族差异上，而是在文化、政治和经济的冲突方面。生物上的种族差异只是附属的原因，甚至可能还是文化差异的结果。中国人在较早的时期对所谓“人”就有不同的看法，往往主观地认为只有汉族人才算是人，其他人则是“夷狄”。因此，我们往往在异族的名称上加了犬、虫、羊等偏旁。一百年前，我们还在用“英猪狗”称呼英国人呢！这是文化差异的生物化。异族人一旦被视为异类或“非人”，任何非人性的行为便可能会发生。这些异类马上变成了可杀可吃的对象，如一般野兽，人类的弱肉强食便由此产生。地理大发现时代以来，西方殖民者在殖民地滥杀无辜土著。他们为了使屠杀合理化，不惜捏造事实，把澳洲土人说成是动物而不是人，把他们描绘成奇形怪状、似

人似兽的样子^①。至于为什么会出现把异族人看成非人的这种普遍现象，人类学家麦克杜格尔博士(Medougall)在1898年就有个说法：“任何动物，其群体冲动，只有通过和自己相类似的动物在一起，才能感到心满意足。类似性越大，就越感到满意。……因此，任何人在与最相似的人类相处时，更能最充分地发挥他的本能作用，并且得到最大的满足。因为那些人类举止相似，对相同事物有相同的情感反应。”^②

从这种解说来看，党同伐异似乎是人得自生物遗传的一种天性。由这种根深蒂固的天性出发，人类种族之间自发地产生彼此敌视和歧视的态度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了。人们在接受相似性的同时必然会抗拒相异性。于是，丑化、兽化、妖魔化异族之人的现象自古屡见不鲜^③。人类学家报告说，从某些未开化民族的古代文献和绘画艺术中，可以找到种族歧视的许多实例。在法国山洞和其他地方发现的人类粗糙画像，大概是描绘旧石器时代的人类的，这些图画或者雕刻，很像近代未开化民族的艺术作品，说明了画动物比画人物容易，画动物的技术要比画人物的技术高超得多。因此，只依靠图画来描述当时存在的人类的生理特征是不可靠的，但是反映巴休人和卡菲黑人战斗的巴休人名画则大不相同。画中两个种族的相对尺寸、不同肤色和两个种族所使用的战争工具都特别具体。一般说来，巴休人夸大了他们自己的某些特征，弱化了其他种族。例如，对方的头部大概被画得很小，而且没有特征、平平淡淡。在埃及，“这种民族歧视倾向较早地出现在埃及史前和史后早期的石板彩画中”^④。

现在，人类经历了种族之间的无数次拼杀，在牺牲了无数同类之后，总算开始认识到不同种族和文化的人，原来都是具有同样本质的人类大家庭

① 陈其南：《文化的轨迹》，春风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49页。

② A. C. 哈登：《人类学史》，廖泗友译，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3页。

③ 参考 W. D. O' Flaherty, *Other Peoples' Myths*, New York: Macmillan, 1988; Gustav Jahoda, *Images of Savages: Ancient Roots of Modern Prejudice in Western Culture*, London: Lutledge, 199; 拙作《山海经与文化他者的神话》，载《海南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叶舒宪，郑在书，萧兵：《山海经文化寻踪》第六章，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④ 普尔(R. S. Poole)：《人类学研究所期刊》1887年第16期；见A. C. 哈登著《人类学史》，廖泗友译，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5页。



中的成员,他们彼此之间并无优劣高下之分,因而是可以和平相处、平等互补的。由于有了这种人类意识,人对自己同类任何歧视、残忍和侵害的行为,都会受到道义上的谴责,被看作人性之中的兽性遗留的表现。人类学这样一门以整个人类为对象的学科,只有在上述的知识全球化的认识的基础之上才有可能建立和发展起来,而这门与殖民统治的需要多少有着一些联系的新兴学科,在其发展和成熟的过程中终于成为反对新老种族主义和形形色色的民族主义的理论基石,也成为批判和解构殖民主义与西方文化霸权的学术先锋。

二、人类学与知识全球化进程

从上述意义上讲,人类学是知识全球化进程的伴生物;反过来看,人类学的发生和发展也积极促进了知识全球化的进程。这种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

第一,人类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非西方的文化传统。人类学家从世界各个边缘地区为我们提供前所未有的“地方性知识”的报告,他们广泛的田野作业经验将西方传统以外的知识和信息传播于世,其客观的结果便是对单一基准的欧洲中心主义知识观发起挑战,对自古希腊罗马以来确立的西方知识体系的普遍价值与合法性提出质疑,促成多元主义的文化思想新格局。

第二,人类学的文化相对主义原则要求一视同仁地看待世界各族人民及其文化,消解各种形形色色的种族主义文化偏见和历史成见。这是对人类有史以来囿于空间界限而积重难返的“我族中心主义”价值取向的一次根本性改变。正如个体儿童认知发展过程就是不断消解自我中心的过程,各民族文化也只有在摆脱了“我族中心主义”的思维和情感定式之后,才有可能客观公正地面对异族人民和异族文化,建立起成熟的全球文化观。

这样一种摆脱了自我中心定式的文化观对于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而言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能够使研究者以中性态度面对其研究对象,减少妖魔化和乌托邦化的作用。出身于人类学专业后来成为著名社会学



理论家的布尔迪厄，在一次访谈中指出：“在我看来，在社会科学中错误的主要来源之一是科学处于一种失控的状态，即没有控制好科学与对象之间的关系，这种状况导致了人们将与对象发生的关系投射到对象上。当我读社会学家写的一些作品时令我感到痛苦的是，那些其职业就是要使社会世界对象化的人，最后被证明他们很少能使他们自己对象化，他们很少能认识到他们那些形似实非的科学话语所谈论的东西其实并不是对象本身，而是他们与对象之间的关系。”^①从布氏措辞中这两个“很少能”的关系可以看出，研究者偏离客观性的根本原因是没有意识到自己作为研究者的本位立场和社会偏见对自己眼光的限制。鉴于此，布尔迪厄提出，一种真正的反观社会学必须不断地保护自己以抵御“认识论中心主义”(epistemocentrism)、“科学家的种族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 of scientist)。这种“中心主义”的偏见之所以会形成，“是因为分析者把自己放到一个外在于对象的位置上，他是从远处、从高处来考察一切事物的，而且分析者把这种忽略一切、目空一切的观念贯注到了他对客体的感知之中”^②。换言之，研究者的自我中心和自我优越感犹如一副有色眼镜，使他无法洞见对象的本色。人类学消解传统的文化偏见的功绩，首先在于为跨文化研究的客观公正性奠定了基本的前提。

第三，人类学与以往的人文社会科学的贵族化倾向针锋相对，更加关注所谓“精英文化”的对立面即“俗民文化”“大众文化”和形形色色的“亚文化”群体，也就是和文化的“大传统”相对的“小传统”。这种平民化的知识取向对于解构文史哲各学科的精英主义偏向，在帝王将相和杰出人物之外去发掘历史和文化真相，具有充分的示范意义。这就给全球范围内的知识构架的重组和学科之间的科际整合提供了有益的借鉴。^③

^① 布尔迪厄：《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布尔迪厄访谈录》，包亚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00—101页。

^② 布尔迪厄：《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布尔迪厄访谈录》，包亚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02页。

^③ 参考 C. Mukerji, M. Schudson, ed., *Rethinking Popular Culture: Contemporary Perspectives in Cultural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1, Introduction, pp. 1-61。

第四,人类学的出现代表着人类知识体系内部划分的一种危机和重新整合的需要。人类学的核心术语“文化”,正是这种知识重新整合的有效概念工具。美国人类学家拉尔斐·比尔斯指出:“在众多有关人的学科中,人类学的特殊作用在于它是唯一汇集全面的、历史的、比较的方法进行研究的学科。全面的方法即是根据人类生存的全部范型来研究人或人类群体。这样,人类学家在对诸如生态、社会关系、经济或艺术等特别领域深入研究时,他们往往要考虑该领域与人本身和人类行为等各个方面的关系。在人类学中,全面论的基本主张是:人类行为产生于文化系统中复杂的相互作用。”^①正是“文化”概念的这种全面论和整合论的特征,使它在20世纪的后期跳出了单一学科的界限,催生出更加具有综合性的跨学科的和反学科的研究新潮流——“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当代从事文化研究的学者们非常清楚地意识到,必须揭露在西方知识传统中构成学科划分的主流意识形态因素,揭露在大学的院系中支配着教学与研究的体制性因素,也就是揭露学院派的历史传承和现实运作背后的知识与权力的关系。文化这一概念的超学科性正好给这场学科批判和反思运动带来一件有效的思想工具。“文化研究的话语必须抵抗学术学科及院系中已确立的利益。它必须质问捍卫各类学科与院系的学术现状的知识要求与理智性模式常出现的围绕在不许在学术学科领域内提出的问题的利益。同样重要的是,文化研究必须谴责学科未提出的问题中包含的利益”^②。由这种激进的打破原有学科划分的批判性要求,我们不难看出晚生的学科人类学所给予的积极影响。人类学大师马林诺夫斯基早在20世纪初叶就预示过,人类学应当是整个社会科学的基础。

斯蒂芬·努贞特(stephen Nugent)在谈到人类学与文化研究的关系时说,二者之间的联系与张力来源于它们的综合性的雄心的相似性。“人类学,由于它以他者的世界和他者的生活为导向,由于人类学家可以通过他

^① 拉尔斐·比尔斯:《文化人类学》,骆继光,秦文山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2—3页。

^② 亨利·吉罗,戴维·季维:《文化研究的必要性:抵抗的知识分子和对立的公众领域》,见罗钢、刘象愚主编《文化研究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90—91页。